

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踪影

赵子祥

一、历史的回顾

现代社会学传入中国，即使从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①一九〇三年出版之日算起，至今也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严复作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社会学著作的目的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思想”。^②严复认为西方社会学的特点在于从事实的观察、归纳出发来认识社会，并用事实加以验证，而社会学的作用却在于帮助人们“了解社会系统存亡兴废的机制。”^③

严复以“群学”的名称介绍了社会学，以后章太炎等思想家相继翻译和介绍西方和日本的社会学，到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期，在美国社会学的影响下，中国的社会学有了较快的发展。尤其在三十年代，旧中国的许多大学已相继建成了社会学系，如：美国教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北京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都开设了社会学的课程和建立了社会学系。虽然社会学在旧中国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总算初步形成了一套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薄弱体系。

应该指出的是，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它必然带有时代特点和政治色彩。几乎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传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社会，早在二十年代，许多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瞿秋白、恽代英等同志，“在上海大学就设立社会学系，宣传革命理论”。^④

当时，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愈加严重，故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注重农村社区和农民，并在农村社会学和社会调查方面出版了一些书籍。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学已初具规模。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许多大学都疏散到偏僻的农村地区，虽然当时的研究条件较差，但有些社会学者仍然坚持专题调查，或者从事有限的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因而，也有时间对以前那种照搬英美社会学以及为调查而调查的方法进行反思。例如：费孝通教授当时在主持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期间，曾对内地的农村和工厂作过一些典型调查，他们的研究成果给国内外的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当时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⑤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后，正当广大社会学者，跃跃欲试，要大显身手之际，由于我

① 即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中文本，1903年出版。

② 严译名著丛刊《群学肄言》，重印“严译名著丛刊”前言。

③ 刘创楚：《中国重建社会学的进展》，《香港明报》1984年6月24日特稿。

④ 王康：《学步集》，“社会学在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 费孝通、张子毅合著：《平凡的中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

们盲目效仿苏联的模式，在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中取消了社会学系，并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了社会学的教学，而社会学专业教师均被抽调到其它学科工作。至此，中国的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便被中止了。

二、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1）重建过程

在一九七六年打倒了“四人帮”以后，迎来了中国科学的新的春天，老一代社会学家们亦开始为重建中国的社会学而奔走。一九七八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精神的逐步恢复，改革、开放、搞活带来了中国社会的深广变革，时代的气氛和需要，使重建社会学的时机成熟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胡乔木同志邀请老一辈的社会学家费孝通、雷洁琼等，在北京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为社会学恢复了名誉，号召分散在各行各业的社会学者归队，鼓励地方成立社会学学会，决定在有条件的大学恢复社会学系。同月，中国社会学会成立（一九八二年改为中国社会学会）。^①

（2）专业人才的培训

中国社会学一恢复就首先抓了人才培训工作。这方面得到了国外社会学者，尤其是外籍华人学者的热情赞助。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著名美籍华人社会学家杨庆堃教授率领美国社会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在北京演讲了“社会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之后，中国社会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同他们商讨了培训中国社会学人才的方案。一九八〇年五月，在北京举办了重建社会学后的第一届社会学讲习班。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十名研究人员参加了学习，于光远、费孝通、雷洁琼、吴文藻、陈道以及香港和美国的学者们都到会演讲或授课。第一期学员毕业以后，第二年夏季又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讲习班。以后几年，分别在天津、武汉、上海举办了共五期这种类型的讲习班，其中南开大学还自办了几期社会学讲习班。这些讲习班，共培训了社会学的研究人员三百余人，他们结业以后，有些已成了社会学研究的骨干力量。

到一九八二年，国内已有四所大学开办了社会学系。其中，上海复旦大学分校（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最先在一九八〇年，由政治系分出部分师生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社会学系，首批培养出的毕业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紧接着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采取先招研究生的办法充实师资，待师资问题解决后，开始招收本科生。现在这些大学的社会学系已初具规模。

社会学的教学活动，在大学中竞相开展，不仅综合大学、师范院校，许多工科和农科大学也开设了社会学课程，甚至在中央党校和部分地方党校也建立了社会学系和社会学研究室。最近，全国又有七所院校在筹建社会学系，它们是：华中工学院、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大学、山西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此外，南京大学、成都师范学院、昆明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大连工学院也成立了社会学教研室，开始讲授社会学课程。在大学，社会学已成为学生们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① 见本期《中国社会学会简介》一编者。

在社会学教学组织逐步建立的同时，地方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机构 and 学会也纷纷成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一九八五年十月，北京、上海、天津、内蒙、广东、贵州、四川、新疆、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河南、吉林、黑龙江、甘肃、安徽等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或社会学学会。截至一九八五年六月的统计，全国已有社会学的专职教学人员四百多人，专职研究人员三百五十多人，兼职研究和教学人员一百五十多人，总计约九百人。此统计尚未包括现在未毕业的大学社会学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约二百五十人。

中国现在的社会学在大学以教学为主，在社会科学院以研究为主，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互相协作，各有侧重。到一九八五年九月为止，一个遍布全国的教学与科研齐头并进的社会学研究队伍已初步建成；同时，各省市社会学会在开展国内外的学术交流、组织社会学的课题协作、传播社会学的知识以及培养社会学的人才方面也相应作出了贡献。

（3）社会学的普及教育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经过老一辈社会学家的指导和年轻一代社会学工作者的努力，中国社会学经过六年的重建，无论是学会组织，还是研究机构；无论是研究人员的素质，还是研究队伍的人数，都已超过了旧中国。

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指导下，联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日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搞现代化需要社会学，社会学能为现代化服务。

一九八五年五月，为了尽快普及社会学的知识，培养出一大批社会工作者，以满足广大群众的业余教育的愿望和社会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市社科所社会学室、中国社会学会、北京市社会学会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五个单位，联合创办了“中国社会学会函授大学”，现有两万五千多名学员。在这些遍布全国各地的函授学员中，不仅有许多青年、中年人，还有不少老干部和各级领导同志。这一事实表明，社会学在中国已具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社会学在中国普及还体现在社会学应用方面，大批在实际部门工作的同志，自觉利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社会调查，利用社会学的观点来分析认识在他们的工作或计划中出现的问题。在众多的刊物上，还大量出现了非社会学专职人员撰写的、带有社会学内容和语言色彩的文章。

这就是中国社会学重建六年来所重点抓的编教材、培训人才师资、大学办系、社会科学院建所、民间成立学会、普及社会学教育等工作。

三、中国社会学在重建中的发展

（1）研究的背景与选题

重建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处处表现出它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改革，给社会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课题和广阔的社会调查领域。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深刻的经济变革，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社会心理、行为方式亦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城乡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家庭结构的巨大变化。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面临着一系列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这个背景

下，各个研究单位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确定了一些选题。这几年较集中研究的问题有：

① 婚姻家庭问题

解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家庭规模逐渐缩小，由一对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日益增多。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其它有关抽样调查表明，我国家庭平均每户人口，一九八二年为四点四人，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京、津、沪、苏、冀、辽、浙地区平均为三点九人。我国农村家庭平均每户人口，一九八二年为五点零六人，城市为三点七四人，中国家庭的小型化削弱了传统家庭的束缚力，淡化了旧的家庭礼法和道德规范，在婚姻家庭方面产生了一系列的新情况。

中国的家庭类型、婚姻状况及发展趋势，离婚的原因以及婚外恋和大男大女的数量增多等，成为近年婚姻家庭研究领域里引人注目的课题。

② 青少年问题

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三十的三亿青少年是中国社会改革中最有生气的力量，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当代中国青少年显示出与中老年很大不同的时代特征，他们思想解放，富有创造活力和进取精神，同时也有他们的苦闷，还有青少年犯罪等问题。他们的作用及行为、思想方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和关怀。全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青少年研究机构，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对青少年各方面状况的调查和研究。

③ 老年问题

在中国社会学恢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许多人开展了对中国老年问题的研究。

从对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老年人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而且规模大、人数多。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中，六十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超过百分之八的已有九个省市，其中上海市的比重更高，已达到百分之十三点三三，即已成为老年型人口的城市。这些变化，为社会学工作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如老年社会福利与福利政策、老年闲暇与生活方式、老年社会地位与赡养责任、老年离婚与再婚心理以及老年医学等问题。

④ 生活方式问题

八十年代的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开始逐步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化。因此，近一、二年来的社会学研究课题更加接近生活实际。这些课题包括：价值观与现代生活方式；科学技术革命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结构和基础；闲暇时间与人才的个性发展；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历史考察及演变；改革、商品经济及开放政策对生活方式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及对家庭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生活方式与生活管理等问题。为了将生活方式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地开展下去，社会学工作者比以往更加注重实际调查。关于农村青年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妇女就业与家庭生活变化以及对离退休干部生活方式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同样引起了社会学者们的重视。

⑤ 人的现代化理论问题

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迅速起步，城市化趋势愈加强烈。人才的流动与职业的选择机会增多，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伴随着科技革命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演变。怎样认识因社会变革而带来的人的社会性的变化，社会学界对社会发展中人的因素、现代化与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的探讨，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理论。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应用社会学中人的社会化、人的现代化以及社会变迁等中层理论，来选择他们

的研究对象和课题。这些课题包括：知识社会学与人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与社会变迁，改革中人的地位和作用；科学管理中的人际关系和角色；行为科学中关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训；现代人的概念和指标测定等。

（2）“社会学热”与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学重建后，逐渐成为一种热门科学。

① 近年来国内各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社会学的论文，调查报告和译文，截至一九八五年上半年，已翻译出版了四十一一种国外社会学著作。山东、天津、甘肃、上海、黑龙江、湖北、广东等出版社已经印行的社会学系列丛书及分科专著到一九八五年上半年止，已有三十七部，涉及十二个分支学科，其内容有社会学文集、社会学概论、社会学的教科书，家庭社会学、劳动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住宅社会学、儿童社会学，社会学工具书和社会学问答、题解以及社会学入门等通俗普及读物。

② 社会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已有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的较深入的探讨。分支学科的研究有家庭社会学、青年社会学、城市社会学、老年社会学、军事社会学、儿童社会学、文艺社会学、大众传播媒介社会学、劳动社会学、职业社会学，还开展了人口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旅游社会学、犯罪社会学以及社会心理的研究。

③ 国内外社会学的学术交流日趋活跃；据不完全统计，社会学重建以来，到一九八五年上半年，中国已派出二十一个社会学学术代表团，一百零七人次对美国、日本、加拿大、南斯拉夫、西德、澳大利亚、瑞典等国进行了学术访问。我国的社会学者还参加了九次国际性的社会学的重要会议。

④ 开展了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课题的调查研究。这些课题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一些地方研究力量协作展开的。其中有由费孝通教授指导、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合作承担的“小城镇研究”课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下，在中国五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成都、武汉）抽样达五千人的“婚姻与家庭”调查课题；与武汉、上海、天津、广东、北京、甘肃、辽宁等地方研究力量协作展开的“当代中国青年工人的状况”的调查研究，抽样达两万人；有与武汉、大连、北京等地方研究力量协作的“大学生德育学”学术研究；还有多方协作攻关的“青少年犯罪学”学术研究等。

⑤ 社会学研究的地方特色：几年来全国地方性社会学研究机构，根据本省、市的特点，在社会学的研究方面各具特色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如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老年和婚姻家庭问题方面的调查研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城市建设和住房问题的研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内蒙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人力支边”的研究；哈尔滨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室对移民问题的研究；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对生活方式问题的研究；以及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联合全国九省二市的社会学研究机构、大学、党校开展的抽样达五千户的《农村家庭与农民生活方式》的调查等项目。

四、目前中国社会学发展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社会学恢复以来这几年，国内社会学的研究主要是把重点放在应用社会学和分支社会学

的理论建设方面，缺乏对社会学的总体理论和研究方法做深入系统的探讨和研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社会学的研究；如何评价和借鉴国外社会学的理论及研究成果；以及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在社会学界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意见，需要我们加强研究，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逐步深化和解决。

在社会学研究条件方面，还存在着机构组织不成系统、力量分散、课题庞杂、经费短缺、手段落后、研究人员的素质差以及基础理论薄弱、图书资料少而利用率不高等问题，这些前进中的困难也有待于克服。

作者工作单位：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宛丽

天津经济社会学研讨会简况

一九八五年元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在天津召开了“经济社会学研讨会”。这次会议是由天津社会学学会主持召开的。与会者就在我国建立经济社会学的必要性、可能性，经济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任务，当前应该研究的主要课题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者一致认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与社会必须协调发展，要达到协调发展的目标，首先要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及其规律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从而制定出科学的发展战略。在经济与其它社会现象的研究中，单靠哪一门学科无法做到全面深刻地认识经济与其它社会现象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更难以预测其发展趋势。当前科学发展出现的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趋势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条件。从根本上说，

建立经济社会学是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经济社会学应该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把经济现象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进行分析研究。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就是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任务，一是通过对经济现象和其它社会现象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及现状的研究，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形成有特点的理论体系。二是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以便为党和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选择提供依据。

与会者认为，当前经济社会学亟待研究的问题有：

一、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包括，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政策，劳动市场、人才市场、信息和技术市场及资金市场，阶级和阶层的状况等问题。

二、社会控制问题。包括如何对变迁中的消极因素加以控制，如何避免那些因变革中某些不合理因素引起的社会动乱，加强大众传播媒介促使人们改变不利于经济改革的旧传统观念，加强改革信息传播，稳定人们的心理，加强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等等；

三、在经济及社会生活之中，个人的行为方式。

(杨津)